

清代两浙文学世家的时空分布与文学建设

曾礼军*

(浙江师范大学 江南文化研究中心, 浙江 金华 321004)

摘要:清代两浙文学世家的区域分布极为不均衡,主要集中在杭嘉湖宁绍五府,其中浙西地区远多于浙东;其时代演变总体上呈现历时递减态势,从清前期到中期世家数量骤然剧减,清后期依然衰减。清代两浙文学世家的文学传承有着鲜明的时代性和地域性,即家族、地域与流派唱和有着高度的融合性。文学世家一方面致力于本家族的文学建设,另一方面又是乡邦文学的引领者和建设者。同时,文学流派和文人结社也往往由家族文人群体组成和参与,建立在家族文化圈的基础上。

关键词:清代两浙;文学世家;时空分布;文学建设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035(2013)01-0001-11

清代两浙文学世家是明清江南文学世家的重要而有机的组成部分,而明清江南地区则是全国文学世家聚集的核心区域,这是一个历史演化的结果。“两汉时代,文学世家的中心区域在黄河流域。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由于大批北方文学世家迁居江南,南北重心发生历史性转移,江南首次成为全国文学世家核心区域所在。至唐代,由于建都长安(首都)、洛阳(陪都),文学世家的中心区域回归黄河流域,然后形成关中、山东、江南三足鼎立的区域格局。北宋末年‘靖康之难’的爆发,又一次引发了北方大移民活动。以南宋首都临安为中心,大批北方文学世家陆续迁居江南,从此之后,江南才真正牢固地确立了其在全国文学世家区域分布中的核心地位,文学世家以江南为中心,然后逐渐向南方广大区域推进。两宋之交,是文学世家最终完成南北重心易位的转折点。”^[1]此后,经过元代的发展,进入明清时期,江南就成了全国文学世家分布的一头独大的核心区域。

清代两浙文学世家作为江南区域的有机组成部分,呈现出地域的自足性与外联性的双重特征。

前者表现在两浙是一个独立的区域整体,后者表现在浙西处于江南核心区域环太湖流域地带。清代两浙文学世家的区域分布极为不均衡,主要集中在杭嘉湖宁绍五府,其中浙西地区远多于浙东;其时代演变总体上呈现出历时递减态势,从清前期到中期,文学世家数量骤然剧减,清后期依然衰减。清代两浙文学世家不仅是世家文学传承的主要载体,而且对两浙地域文学、清代文学流派和文人结社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在家族文化圈的基础上,家族文学、乡邦文学和文学流派具有高度的融合性,而结社唱和也往往由家族文人群体组成和参与。

一、清代两浙文学世家的时空分布

清代两浙文学世家的区域分布极为不均衡。笔者根据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龚肇智《嘉兴明清望族疏证》、徐雁平《清代文学世家姻亲谱系》上编,以及方志、家谱等其他相关资料统计,清代两浙地区大大小小的文学世家共有405家。其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

* 收稿日期:2012-09-12

作者简介:曾礼军(1970-),男,江西吉安人,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文学博士。

表1 清代两浙地区文学世家分布情况

地区分布	世家数量	地区分布	世家数量	地区分布	世家数量	
杭州府	钱塘	58	归安	27	鄞县	17
	仁和	35	乌程	9	宁波府 慈溪	5
	海宁	30	湖州府 德清	7	镇海	2
	余杭	3	长兴	2	定海	1
	富阳	2	武康	1	临海	3
	秀水	28	安吉	1	黄岩	1
	嘉兴	41	山阴	7	台州府 天台	1
嘉兴府	嘉善	25	会稽	10	太平	1
	平湖	27	绍兴府 余姚	5	宁海	1
	桐乡	17	诸暨	3	金华府 兰溪	1
	海盐	12	萧山	3	永康	1
	石门	6	上虞	6	衢州府 龙游	1
	严州府 遂安	1	处州府 青田	2	温州府 瑞安	2
		1		2		2

由上表统计可知,杭州和嘉兴两府是清代浙江文学世家最密集的州府,分别有128和156家,两者加起来占到全省的70.1%。其中,杭州府突出的文学世家有陆圻家族、汪宪家族、汪汝谦家族、汪由敦家族、陈兆崙家族、梁诗正家族、许学范家族、袁枚家族、丁丙家族、黄树谷家族、潘庭筠家族、夏曾佑家族、卢文弼家族、韩文琦家族、金甡家族、沈元沧家族、陈鸿宝家族、龚自珍家族、丁澎家族、赵昱家族、钱树家族、许宗彦家族、孙宗濂家族、陈元龙家族、查慎行家族、许汝霖家族、马思赞家族、蒋星楷家族、葛徵奇家族、陆嘉淑家族、祝维诰家族、朱尔迈家族、朱方增家族、沈开勋家族、俞兆岳家族、吴騫家族、张嘉论家族、陆以钧家族、许槌家族、郭沈彬家族、董邦达家族、严沆家族,等等;嘉兴府突出的文学世家有朱彝尊家族、钱载家族、李良年家族、王又曾家族、张天柱家族、曹溶家族、项元汴家族、陶世仁家族、金德瑛家族、李日华

家族、沈进家族、沈璐家族、沈君儒家族、徐世淳家族、徐石麟家族、徐在家族、计光圻家族、王翊家族、王焯家族、张廷济家族、金锡鬯家族、沈曾植家族、钱继章家族、朱之荣家族、蒋芬家族、程维岳家族、黄鼎家族、柯煜家族、李光尧家族、曹尔堪家族、魏学濂家族、陈世钤家族、周全锡家族、丁大椿家族、金安清家族、沈廷光家族、陆陇其家族、陆之祺家族、陆文元家族、沈岸登家族、高士奇家族、张诚家族、朱壬林家族、葛金娘家族、张元济家族、彭孙遹家族、钱枋家族、俞长城家族、朱明仪家族、金士瑜家族、冯景夏家族、陆元鋹家族、汪文桂家族、汪曾裕家族、陆费墀家族、吕留良家族、吴之振家族、徐宝谦家族,等等。其次是湖州府,有文学世家47家,较为突出的有沈子来家族、沈子木家族、姚文田家族、叶佩荪家族、孙在丰家族、夏祖勤家族、钱恂家族、董说家族、张映斗家族、温一清家族、徐天柱家族、蔡启傅家族、俞樾家族等。再次

是绍兴和宁波两府,分别有34和25家。其中,绍兴府突出的文学世家有周懋宗家族、祁彪佳家族、何天宠家族、吴楚材家族、俞文葆家族、姜承烈家族、章学诚家族、宗稷辰家族、黄宗羲家族、陆宇燏家族、邵曾可家族、史孝咸家族、朱迥然家族、余缙家族、陈洪绶家族、毛奇龄家族、汪辉祖家族等;宁波府突出的文学世家有钱肃乐家族、万斯同家族、董德儒家族、李邺嗣家族、全祖望家族、范光文家族、范光明家族、叶声闻家族、姚燮家族、黄式三家族等。最后,其他州府的文学世家极少,基本上只有一两家。其中较为突出的文学世家有临海洪颐煊家族和屈墨林家族、天台齐召南家族、永康胡凤丹家族、兰溪李渔家族、瑞安孙诒让家族和黄体芳家族、龙游余可大家族等。

总体上看,清代两浙文学世家主要集中在杭嘉湖宁绍五府,其中浙西文学世家要远远多于浙东地区,浙西共有331家,浙东只有74家,两者所占比例分别为81.7%和18.3%。无论是浙西还是浙东,文学世家聚集的地区基本上是临江临海的平原地带,前者是杭嘉湖平原,后者是宁绍平原。

清代两浙文学世家区域分布的形成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文化传统和学术渊源等是最主要的因素。

第一,清代两浙文学世家的区域分布与地理环境有密切关系。世家传承首先离不开人口繁衍,而人口繁衍又需要有宜居的地理环境,特别是在以农耕经济为主导的封建社会,自然地理的依赖性更为突出。清代两浙文学世家聚集的杭嘉湖平原和宁绍平原都适宜于农耕生产和经济发展,有利于人口繁衍;但浙西的杭州、嘉兴和湖州则处于江南的最核心区域——环太湖流域。环太湖流域水源丰富,土地肥沃,物产丰饶,非常利于人口繁育和经济发展。清代陶澍指出“天下之水利,莫大于江南,太湖又江南水利之大者也。……早潦于是乎备,衣食于是乎生,财赋于是乎出。”^[2]显然,杭嘉湖平原更有利于人口增长。“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的人口数量普遍达到相当大的规

模,不仅居民在千户以上的市镇大量涌现,而且形成了一批超过万户的巨镇。如湖州的南浔、新市、双林、菱湖,嘉兴的濮院、王江泾、新塍(新城)、王店,杭州的塘栖、硖石,以及兼跨湖州和嘉兴两府的乌青等镇,人口一度达到万户以上。”^[3]同时,杭州是省府所在地,嘉兴是江浙沪三省交界处,交通网络十分发达,这不仅便于人员辐辏、文化交流及家族联姻,而且有利于省内外的外来人口和家族的侨居。

第二,从经济条件来看,杭嘉湖平原和宁绍平原都以农耕经济为主,但杭嘉湖平原的经济发展更具个性特征,除了传统的农耕经济外,还有着更为繁荣的工商业经济,由此促进了乡镇勃兴和人口暴增。有研究者指出“明中叶以后,以蚕桑为标志的商品化农业以及随之兴起的丝绸、纺织等家庭手工业、手工作坊的推动,促进了杭嘉湖地区乡镇的勃兴与繁荣。”^[4]浙西地区也由此出现了许多资本雄厚的豪商巨贾,如南浔镇有号称“二狮”、“四象”、“八牯牛”、“七十二狗”的大商人,他们都是靠蚕丝贸易起家的,其资产分别在1000万以上、100万以上、50万以上和30万以上。毫无疑问,繁荣的工商业经济发展,十分有利于文学世家的生存和发展,因为世家的形成和持续发展都需要有相当的经济实力,诸如科举、藏书之类都离不开家族的经济能力,而且商业经济比起农耕经济更能快速促进家族的繁荣和文化的发展。在清代,许多文学和文化世家是由商业大家作华丽转身而形成的。如南浔“四象”中的庞云曾和顾福昌家族即是如此,当他们经商积累了大量财富后,他们的下一代在继承父辈的商业财富时也转向了家族文化发展,形成了金石书画收藏和鉴赏家族。又如龚自珍家族,其文学世家的形成也是由经商而来,龚自珍的高祖龚茂城、曾祖龚斌、叔祖龚治身都是经商能手,积累了大量财富。龚自珍的祖父龚敬身则是由商籍拨入仁和县学附生的。

第三,文学世家的传承和发展还离不开人文蔚起的文化环境。浙西比浙东具有更深厚的文化

传统,这可以从科举和藏书两个文化指标看出。科举对于一个家族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化意义。因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不管是力耕起家还是经商致富,不管是由行医还是教馆博得声望,要跻身望族行列或者维持望族地位,科举入仕是最为重要的途径”。^[5]清代科举进士以江苏和浙江两省最多,其中浙江省共有2808名,占全国的百分之十还多。在浙江省内,“杭嘉湖绍宁共2553名进士,占整个浙江的91%。杭州共有893名进士,绍兴有563名,嘉兴有504名,湖州有368名,宁波有255名。这五个府平均所属各县人均进士也是杭州最多,99人,嘉兴72人,绍兴70人,湖州53人,宁波38人。”^[6]浙西与浙东所占比例分别是62.9%和37.1%。就浙西各府来看,杭州府主要集中在钱塘、仁和、海宁等县,嘉兴府主要集中在嘉兴、秀水、嘉善、平湖和桐乡等县,湖州府主要集中在乌程、归安和德清等县。这表明清代两浙文学世家的区域分布与科举分布具有大体的一致性,体现了浙西文化传统的深厚性。就藏书来看,清代私人藏书也是以江浙地区为盛。据范凤书统计,清代万卷私人藏书家共有543人,浙江有137人,其中杭州49人,嘉兴28人,湖州8人,绍兴16人,宁波17人,台州4人,金华7人,温州5人,处州3人。^[7]杭嘉湖绍宁五府共有101人,占全省的73.7%;浙西与浙东所占比例分别是62%和38%。这也与两浙文学世家的区域分布具有大体的一致性。

第四,从学术渊源来看,自宋代以来,“浙学”就“表现出了‘东’强‘西’弱的特点。比如徐象梅所撰的《两浙名贤录》,在《硕儒》、《理学》等章节中,宋、元、明三代共录有330人,其中出身浙东的有279人,而出身浙西的仅为51人,接近六比一。如果考虑到编撰者徐象梅是钱塘出身,而参阅者绝大多数系海盐、嘉兴人(所以在该书所收录的51个浙西人中,大部分为海盐、嘉兴人)……那么以上这组数字便更能说明浙省‘东’强‘西’弱之程度。”^[8]清代浙东学者章学诚对两浙学术特点

归纳为“浙西尚博雅,浙东贵专家”,^{[9]48}而他自己也强调“道欲通方,而业须专一”。^{[9]47}由于强调学术的“专家”和“专一”性,这虽然有利于学术的发展,却不利于文学及文学世家的传承和发展。因此,“浙学”的“东”强“西”弱与文学世家的“东”弱“西”强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

此外,浙东作为清初抗清最坚强的前沿阵地和康熙初年“三藩之乱”波及的地区,其文学世家的生存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如宁波钱肃乐家族和张煌言家族都在抗清后走向了衰落。但由于整体上破坏性不强和时间较为短暂,这不能成为浙东文学世家分布少的主因。

综上所述,清代两浙文学世家区域分布格局的形成是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自有其内在的偶然性和必然性。

清代两浙文学世家的时代演变总体上呈现历时递减的态势。整个清代近270年,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顺康雍是前期,乾嘉是中期,道咸同光宣是后期。每个分期大致为90年左右,以30年为一世,一个分期大致可以传承世家三代。据此,试以嘉兴府156家文学世家为例来作统计:(1)跨越前中后三期的文学世家有7家;(2)跨越前中期的文学世家有23家;(3)跨越中后期的文学世家有17家;(4)纯前期的文学世家有56家;(5)纯中期的文学世家有28家;(6)纯后期的文学世家有25家。其他几个州府情况也大致如此。由此可以看出,清前期的文学世家最多,清后期的文学世家最少,其演变规律是历时递减的态势。特别是由清前期进入到清中期,文学世家的数量骤然剧减,两者几乎是二比一的比例。

文学世家的兴盛和衰落都是一个历史过程,而非突然发生的。清代两浙文学世家由前期到中期,其数量骤减与明清易代造成新老世家交替断层有着密切关系。清前期的文学世家大都是承明代而来。由于根深蒂固的华夷观念,江浙“这地方是人文渊薮,舆论的发纵指示所在,反满洲的精神到处横溢”,^[10]这就造成了两种十分不利于两

浙文学世家传承的后果。一方面,这些承明而来的世家大族,为了坚守民族气节或是惧怕清廷迫害,许多家族或家族主干有意不仕清廷或拒绝科考,过着一种隐逸而居的生活。放弃科举入仕就等于放弃了继续跻身望族,放弃了世家文脉传承。经过清前期二至三世的发展以后,其家族衰落的负面影响就显现出来了。例如湖州董氏家族是明代的文化望族,董道醇长子董嗣成、仲子董嗣茂、季子董斯张三支,皆有文才挺出于世者。明清鼎革之后,“董嗣成一支,由于其孙董汉策带头降清,家族成员积极入世,因此该支至乾隆间,在文采与产业上仍保持较强盛势头。董嗣茂一支,因其子孙被刁民王式构陷,牵连进沈重熙通海案中,家族经济基础遭到重创,到曾孙辈已典尽家产,沦落为没有文化的人,甚至是赌徒了。董斯张一支,因其子孙董说、孙董樵、董耒等坚持民族气节,不与清廷合作,故文采虽然富盛,但其孙辈时经济上已接近平民了”。^[11]另一方面,则是清廷对两浙文人及其家族的有意打击和迫害,最典型的即是清前期文字狱。康熙时期的文字狱主要在于打击反满的士大夫,对家族破坏较大,而浙江又是文字狱的重灾区。查嗣庭案后,雍正四年还下令停止浙江士人的乡试会试,禁期长达六年之久,这些都对清前期两浙文学世家传承产生了破坏性影响。由明入清的旧世家快速走向衰落,而清前期科举入仕的新兴世家又需较长时间的培育。有研究者通过对明代望族形成的研究得出,由白丁家族到官宦位置,一般需要4.7世,而遭受战乱、朝代更迭等因素干扰,则需更长时间。^[12]而两浙作为一个特殊的反清地域,清廷对两浙文人入仕有着或隐或显的压抑,不使其进入较为顶层的精英统治圈(尽管两浙有着众多的科考中举人士),这就更增加了新兴世家崛起的难度,由此也就形成了新旧世家交替的断层,两浙文学世家由清前期进入中期后因此而骤然剧减。

由清中期到后期,两浙文学世家依然衰减,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

战争对浙江人口造成巨大损失,特别是后者重创了人口增长。自咸丰八年(1858)石达开进占衢州至1864年整个浙江被收复,全省人口由战前的3127万变为战后的1497万,人口损失1630万,损失比例为52%。若就文学世家聚集的五府来看,其人口损失比例大多数要更高。其中嘉兴府的战后人口仅及战前的34.3%,人口损失208.7万,损失率高达65.7%;杭州府的战后人口仅占战前的19.4%,人口损失300万,损失率为80.6%;湖州府战后人口仅存63.2万,人口损失235.7万,损失率达78.9%;绍兴府战后人口约有260万,人口损失近400万,损失率为60.6%;宁波府战后人口有274.2万,人口损失100万,损失率为36.5%。^[13]人口是世家传承的基础,大量的人口损失自然重创了文学世家的传承。二是浙江科举进士在“嘉庆之后属下降期,其比率越来越低于平均比例……同治年间最低,仅为6.8%”,因为“清代后期增长的进士数额,主要体现在内地、边远省份进士人数的增长”。^[14]由于科举入仕是成为望族世家最为重要的条件,所以科举进士数量的减少,自然也影响到了清后期两浙文学世家数量的增长。

概而言之,由于科举入仕是世家望族形成的关键因素,人口增长是世家传承的基本条件,清代两浙文学世家的历时演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两者的变化。

二、清代两浙世家的文学建设

清代两浙文学世家的文学传承有着鲜明的时代和地域特点,即家族、地域与流派唱和有着高度的融合性。文学世家一方面致力于本家族的文学建设,另一方面又是乡邦文学的引领者和建设者。同时,文学流派和文人结社也往往由家族文人群体组成和参与,建立在家族文化圈的基础上。

(一) 文学世家与家族文学传承

家族文学传承首先离不开家族教育。家族教育一方面可以凸显家族意识,另一方面则可以形

成具有个性的家族文学传统。如秀水朱氏世家文学,其经史和文学并重的家族文学传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代代相传的家族教育。朱彝尊说“先叔父芾园先生行第八,少补学官弟子,远浮名,务实学……先后授徒三十余载,弟子著录百人,彝尊亦从受业。崇祯之季,文尚浮华骈丽,先生独赏嘉定黄蕴生文,以稿相授。既而语彝尊曰‘河北盗贼,中朝党乱,乱将成矣,何以时文为?不如舍之学古。’乃授以《周官礼》、《春秋左氏传》、《楚辞》、《文选》、丹元子《步天歌》。人皆笑以为迂,俄而乱不可遏矣。”^[15]芾园先生朱茂院对时事的洞彻和高起点的文学教育,对朱彝尊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后,朱彝尊“弃举子业,学古文,博极群书。……故所作文,考据古今人物得失为最工,而经传注疏亦多所发明”。^[16]而朱彝尊又以此家学教育子孙,其曰“凡学诗文,须根本经史,方能深入古人窠奥,未有空疏浅陋、剿袭陈言而可以称作者。”^[17]朱彝尊的子孙朱昆田、朱稻孙、朱桂孙、朱休度、朱休承等,皆能承家学,传承着朱氏世家的文学传统。

不仅家族男性重视子孙教育,家族女性也是子孙教育的重要承担者,特别是当男性早逝或外出游学、游宦、游幕、游商时,家族女性的教育作用就更加突出。如杭州顾若璞,其夫黄茂梧英年早逝,公翁黄汝亨教其文学,使其传授子孙,“幸二稚孙稍稍见头角,妇慧哲,晓文理,能为母,可督教成之,儿所幸不亡者是耳”。^[18]顾氏二子及孙均赖其教育成人。家族女性之所以能承担家族文学教育,是因为她们有着较为深厚的文学修养,有的还创作了丰富的文学作品。虽然这些女性文学作品“明显表现出以时代、社会的共同写作标准(这种标准往往被女性主义者判定为男性标准)自律的意识”,^[19]³¹⁹然而正是这种自律意识,使得其文学创作能够与家族男性思想及其文学创作进行接通,为承上启下的家族文学传承起到了重要作用。由于承担教育的家族女性往往是族外嫁入者,她们不但能够传承男方的家族文学传统,而且有时

还能够为其注入新的能量和活力。如秀水钱氏家族,陈书嫁入钱家以前,钱氏家族基本上是纯诗文之家,很少有人懂绘画,此后由于陈书的教授,钱氏家学由诗文转为艺文,众多的钱氏子弟兼擅绘画。钱陈群曰“先母陈太夫人善山水、人物、花树、翎毛,上为亲题品藏内府甚夥。布衣张庚、舍弟施南司马界、从侄元昌视察、维城学部、从孙编修载皆受先慈画法,亦如四家之宗卫夫人也。”^[20]钱界、钱元昌、钱维城、钱载皆出于陈书门下,接受了陈书的绘画技艺。此后,很多钱氏子孙都懂得绘画,有的还纯以画知名于当时。

家族文学传承除了受家族教育影响外,还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由于“浙西尚博雅,浙东贵专家”,浙东重经史学术,浙西重文学艺术,因此浙东的文学世家不但数量少,而且多为学术主导型;浙西文学世家则数量多,同时兼顾艺文和学术,更具全才和全能型。由此形成浙东与浙西家族文学传承的差异性,最典型的就章学诚与袁枚的对立和批判。袁枚主性灵说,并且广收女弟子,此举遭到章学诚的激烈批判。章学诚认为:“从来诗贵风雅。即唐、宋诗话,论诗虽至浅近,不过较论工拙,比拟字句,为古人所不屑道耳。彼不学之徒,无端标为风趣之目,尽抹邪正贞淫,是非得失,而使人但求风趣。甚至言采兰赠芍之诗,有何关系而夫子录之,以证风趣之说。无知士女,顿忘廉检,从风波靡。是以六经为导欲宣淫之具,则非圣无法矣。”^[9]¹⁶⁰这体现了浙东与浙西不同地域文化对家族文学传承的影响。就两浙整体而言,由于浙江是抗清的前沿阵地,遗民情怀浓厚,浙东文化影响深远,清代两浙家族文学传承一方面表现出宗宋和重经史的传统,张仲谋指出清代浙派诗学具有“宗宋、主性情、重学问”的特点,正是缘于此;另一方面则表现出与精英文化圈相离立的态势,所谓“浙东风尚,各以孤峭之质,传幽渺之音,自辟町畦,不随时好”,^[21]即是对这种文化态势的归纳。

家族文学传承也会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清

代前期大量兴起文字狱,尤以乾隆朝为最。严酷的文字狱对时代学术和家学传承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训诂考据为主要特征的乾嘉学派即是此背景下形成的,而两浙家族文学传承也于此产生了深刻的变化。如秀水李氏世家,清初的李良年、李绳远、李符等人承其家学以文学名世,称为“前三李”;进入乾隆,李良年曾孙李集开始以经学名世;此后,李集子李旦华亦留心经术,而李旦华子李遇孙、从子李超孙、李富孙皆以经学著称,称为“后三李”。李氏家族也由文学世家走上了学术世家的道路。

综上所述,清代两浙家族文学传承与家族教育、地域文化和时代风气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是三者综合作用的结果。

(二) 文学世家与乡邦文学建设

文学具有地域性,自古而然,而文学家家族成为地域文学的主力则始自六朝,经唐宋发展,到明清达到鼎盛。清代两浙地域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两浙文学世家为主体而建构起来的区域文学。这主要表现在文学世家是地方文学的创作主体,并且以其文学成就和示范力量推动了地方文学的繁荣和乡邦意识的形成。

文学世家对于乡邦文学的建构作用首先体现在文学世家是乡邦文学的创作主体,家族文学是乡邦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家族文人群体众多,家族文学成就突出,文学世家往往是乡邦文学的核心主体。如李良年家族是秀水梅里文学的主体,在李稻旌、李集《梅会诗选》中李氏家族成员就达到二十多人,包括李良年、李绳远、李符、李富孙、李遇孙、李超孙、李应徵、李衷纯、李士标、李寅、李明慙、李光基、李镜、李兆鋹、李允铨、李绣、李宣、李宗渭、李之槭、李宗仁、李成大、李潮阶、李菊房、李振鹭、李旦华、李集等人。又如蒋楷家族是海宁硖川文学的主体,“《硖川诗续钞》收录二百余家诗作,其中蒋家文士有二十三家二百五十七首诗作,与《续钞》的整体情况相比,这一群体和数字能显现蒋家文士在硖石所占的席位。”^[22]

由此可见,家族文人群体是乡邦文学的重要创作主体。

文学世家不仅是乡邦文学的创作主体,而且还以其独特的文学声望和榜样力量带动了地方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地方文学是相对经典文学而言的,蒋寅认为“经典文学”与“地方文学”具有“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对应关系,“前者意味着整个民族文学传统,固然是精英的,但未必是城市的;后者意味着局部的地方文学传统,虽是乡土的,但决非通俗的”。所谓文学小传统是指“人们在一定地域范围内体认的具有自足性的文学历史及其所包含的艺术精神与风格特征”。^{[19]70}人们在进行文学学习、模仿和创作时,“相比整个古代诗歌大传统,乡邦文学的小传统更密切地包围着他们,给他们有形或无形的影响”。^{[19]78}由于文学世家是乡邦文学的创作主体,乡邦文学的风格、特征和精神在很大的程度上都取决于家族文学,因此在这种自足性的地方文学空间范围内,文学世家的示范作用就显得特别突出,极大地推动了地方文学的发展和繁荣。

文学世家还对地方文学的乡邦意识具有重要的激发作用,这主要体现在致力于地方性文学选本的编刊。如梅里李氏家族几代人都致力于梅里文学选本的编刊。李良年从祖李光基与同乡周笈、沈进编辑了《梅里诗抄》二十卷,李良年从叔李维均又辑有《梅会诗人遗集》十三种,李良年曾孙李集与嘉兴李道旌共同编纂了《梅会诗选》三十三卷。地方性文学选本的编刊体现并推动了乡邦意识的凸显。如黄宗羲评鄞县李邨嗣编纂的《甬上耆旧诗》曰“先生愍郡中文献零落,仿遗山《中州集》例,以诗为经,以传为纬,集《甬上耆旧诗》,搜寻残帙,心力俱枯。其布衣孤贱,尤所惋结,宛转属人,则顿首丁宁,使其感动,夺之鼠尘、绩筐、饬笛之下,以发其光彩。”^[23]全祖望则评曰:“以其余力任甬上文献之重,辑前辈遗诗,遍为作传,粉社风流,藉以不坠。”^[24]

由于乡邦文学是一个相对概念,而一个地区

的文学世家又往往同时并存多个家族,因此文学世家群体的不同区域分层,直接呈现了不同乡邦文学的地域特色和乡邦意识。就地域和乡邦内涵而言,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划分:一是自然区域,如以钱塘江为界而划分为浙东与浙西;二是行政区域,此又可以从三个层级来划分,包括乡镇、郡府和省三级;三是文化区域,如越文化区域。三种区域分层的标准各有侧重,但又互有牵涉和包涵,有时还难以作具体区分。任何一个乡邦文化都依赖此三者而存在,自然区域是乡邦的基础,行政区域是乡邦的界线,文化区域则是乡邦的标志。以行政区域分层来看,最小的是乡镇,如梅里文学,除了李良年家族外,还有缪永谋家族、周笄家族、史宣纶家族、王庭家族、徐在家族和杨谦家族等,这些文学家族群体直接体现了梅里的乡邦文学内涵和地域特色。扩而广之则是秀水文学,秀水地区有几十家文学世家,除李良年家族外,诸如朱彝尊家族、钱载家族、王又曾家族、曹溶家族、金德瑛家族、项元汴家族等都是当地的重要文学世家,名扬区域内外。最大行政区自然是浙江省,全省共有四百余家文学世家群体。不同区域范围的文学世家群体,表现出不同的区域文化特征,如浙东与浙西就有“醇雅”与“博雅”的区分。

文学世家是乡邦文学建设的主体,而乡邦文学则反过来凸显文学世家的社会声望和文化话语权。如杨蟠《三李先生祠堂记》曰“吾里称诗礼之家必首李氏,诸子弟衣冠朴茂,立言必有根据,识者不问而知为秋锦(李良年)先生后人。”^[25]李氏家族由于突出的文学成就而被视为梅里的家族典范和文化标志,这极大地凸显了李氏家族的社会声望。这种社会声望又有利于文学世家个体对于地方文化话语权的掌控。如由李氏家族成员李光基参与编纂的《梅里诗钞》,其凡例曰“里中诗派,夙有传人。自世父伯远公有《霍园集》,先大夫有《激楚斋集》,维持风雅,里中同好,不少唱酬。”李氏家族文化被厘定为梅里的地方文化源头,凸显了李氏家族的文化话语权,而这种地方文

化话语权的掌握又进一步促进了世家文学和文化的良性发展。

(三) 文学世家与文学流派发展

文学流派一般被认为形成于建安时期,成熟于唐宋时期,繁荣于明清时期。^[26]明清时期的文学流派不仅数量多,而且特色鲜明,文学流派与地域文学、文学世家得到了高度融合,即文学流派既具有文人唱和的流派性,又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同时又以家族文人群体为主导。清代两浙的文学流派即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主要有柳洲词派、西陵词派、梅里词派、浙西词派等词学流派,柳洲诗派、西陵诗派、秀水诗派和浙派等诗歌流派。这些文学流派由清初的多头发展,最后汇入浙西词派和浙派诗歌当中,在清中叶康熙、乾隆年间风靡一百余年,至嘉庆初年以后渐趋消歇。^[27]

清代两浙文学流派的发展演变是建立在家族文化圈的基础上的。首先,家族文人群体是文学流派唱和的主体。如柳洲词派涉及到众多的文学世家,其中核心家族圈有曹尔堪家族、魏学濂家族、钱继章家族等,此外还有陈龙正家族、夏允彝家族、徐石麟家族、袁黄家族、柯耸家族、孙复炜家族、计善家族、支大伦家族,等等。秀水诗派的发展演变也是以家族文化圈为基础。《晚晴谿诗汇·诗话》曰“箠石斋论诗,取径西江,去其粗豪,而出之以奥折。……金梭门总宪名辈较先,论诗与相合,而万循初孝廉光泰、王谷原刑部又曾、祝豫堂典籍维诰、汪康古吏部孟錡、丰玉孝廉仲鈞,相与酬唱,皆力求深造,不堕恒轨,一时遂有‘秀水派’之目。继其后者,箠石子百泉编修世锡、豫堂子明甫孝廉嘉、谷原子秋胜大令复,各能尊其家学。”其涉及的文学世家有金德瑛家族、钱载家族、王又曾家族、祝维诰家族、汪孟錡家族等。浙西词派也是以家族文人群体为基础,其核心家族有朱彝尊家族、李良年家族、沈皞日家族和龚翔麟家族。

其次,家族之间的唱和、联姻和师从是文学流派群体维系和巩固的重要方式。如光绪《嘉善县

志》卷三“古迹”曰“崇祯间,钱继振、郁之章、魏学濂、魏学渠、曹尔堪、蒋玉立,每月于此会文。邑侯李玉陈题其堂曰‘八子会文处’。”这是柳洲词派早期的唱和,涉及到钱氏、魏氏、曹氏等家族。而家族联姻更是把文学流派内部的家族成员交织成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如秀水诗派的家族间联姻即是如此,金德瑛娶汪文桂孙女、汪绍焯女汪氏,生子金洁,而金洁又娶汪文桂曾孙女;汪文桂孙汪上墉娶祝维诰妹,汪上墉子汪孟錡娶祝维诰女,又娶金姓女,汪孟錡妹适祝维诰子祝喆;钱陈群孙钱豫章娶金洁女金孝维。有的则是师徒相授,秀水诗派中朱休度受学于钱载,而后又授教于钱仪吉、钱泰吉兄弟。

再次,家族文学的理论观念是文学流派的基础。家族文人群体是文学流派的创作主体,家族文学的理论观念往往就是文学流派的基础,所以文学流派理论主张、精神导向和文学风格都是在家族文学传统的基础上而形成的,由此也决定了以家族文化圈为基础的文学流派理论主张和风格追求并不完全一致,而是有着较为鲜明的家族色彩。朱彝尊《叶指挥诗序》曰“惟吾里之诗,影响虽合,取而绎之,则人各一家。作者不期其同,论者不斥其异,不为风会所移,附入四方之流派。”^[28]这正指出了以家族文化圈为基础的文学流派特点。

最后,家族文化圈是文学流派赖以存在的基础,文学流派的传承也往往依赖于家族文学的传承,并且随文学世家的衰落而衰落。有研究者就指出“柳洲词派最有特点的传承方式就是以家族文化为主体的一种世代传承。这种传承不属于作家个体之间风格上的相互影响和承继,而是以家族群体的方式进行文学上的相互影响和代代相承。”^[29]清早期诸多的文学流派都走向了衰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与之相关的文学家族走向了衰落,这也包括柳洲词派。

文学世家是文学流派发展演变强有力的主导因素,而文学流派的形成发展对于世家文学的传

承也有着重要意义:一是拓展了家族文人群体的生存空间和社会交往范围;二是促进了家族文学的社会影响和价值认可;三是提升了文学世家的地方文化话语权。

(四) 文学世家与文人结社唱和

结社是古代文人雅集的一种独特活动,于明代为烈,清代持续发展,其地域分布主要集中在江南等南方地区。就两浙地区而言,清代文人结社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明末清初时期,此期承明而来,结社者多为明遗民,结社活动多为遥寄国难的遗民活动。如由全祖望族祖全美闲主持的“弃繯社”,全祖望《鮑琦亭集外编》卷八《族祖芻翁先生墓志》曰“芻翁先生,讳美闲……国难后,自以明室世臣,不仕异姓,集亲表巨室子弟为弃繯社。”二是清前期,即康熙、雍正时期,此为结社的转型期。由于顺治二年诏令严禁集社结盟,顺治十七年又诏准“不得妄立社名,投刺往来亦不许用‘同社’、‘同盟’字样”的奏议,其中浙江的杭州、嘉兴和湖州就是查禁的重点地区,再加上满清统治基本稳固了全国的政权,因此两浙文人结社虽然发展态势没有受到太大影响,但其内涵却有了较大变化:一方面结社者大大地超越了明遗民的范围,另一方面结社活动由重政治导向转向了重诗文唱和导向。如绍兴的“龙山诗巢二十子”,乾隆《绍兴府志》曰“越人即西园故址构庐以祀六君子,名为诗巢。国朝康熙间,商和、何嘉珩重葺,集同志者联吟其中。”其活动即多为诗文唱和。三是清中期,即乾隆、嘉庆时期,此期结社承康雍而来,结社活动更加注重诗酒娱欢的娱乐性和消遣性。如慈溪叶炜主持的“白湖诗社”,“与兄弟一门相酬倡,或乘兴与二三知己,放櫂白湖,挈榼传花,吟啸风月”。^[30]四是清后期,即道光中期至清末,面对内忧外患的时局,文人的济世之心得到激发,结社活动重启了政事内涵。如道咸年间周星誉主持的“益社”,有感于“道光末祚,风雅道衰,吴越夙称文教之区,而典型颓谢,风流然,后进少年几知经史文章为何物”,因此“慨然有兴复

之志”希望复兴到康乾盛世，^[31]其政事导向十分明确。而光绪末年由嵊县骚人秀士组织的“鹿泉诗社”、“越社”更是直指反清的政治斗争。^[32]

清代文人结社如同文学流派，很大程度上也是建立在家族文化圈的基础上的。家族介入文人结社的方式主要有三种：其一是家族主导型，即结社是以一个或多个家族成员为主体，联络部分其他文人。如钱塘东轩吟社，由汪氏家族为主导，同时涉及到仁和孙氏、许氏等家族。又如吴兴“双溪雅集”和“竹溪文会”，虽不以社命名，也具结社性质。前者是以竹墩沈氏和前邱吴氏两家为主导，清人戴璐《吴兴诗话》卷一五曰“康熙中叶后，吾湖诗派极盛于竹墩、前邱。两溪相望不三里，而近所传《双溪唱和诗》是也。”诗集共有29人，其中沈氏家族11人，吴氏家族7人；后者纯以沈氏家族为主，《双溪倡和集》共有27人，其中沈氏家族21人。其二是家族参与型，即结社不倾向于以某个家族为主体，但参与者大多来自名门望族。如西湖八子社（全祖望《鮑埼亭集外编》卷六《湖上社老晓山董先生版文》：陆宇燏、毛聚奎、董德偁、纪五昌、李文缵、周昌时、沈士颖、方授等八人）除方授为桐城人外，其他基本上都出自鄞县望族。其三是家族内部型，即结社在一个家族内部成员之间进行。这种结社形式相对较少，主要局限于家族女性的结社，如清初山阴祁彪佳家族一门女性群从的唱和。

家族介入文人结社有多重原因：首先，世家大族人才鼎盛，他们需要结社来进行唱和交流；其次，世家大族具有相当的经济实力，能够为结社提供物质保障，诸如结社的场所、结社的财物等都要有经济作支撑；最后，清初对文人结社的禁止及清前期大肆兴起的文字狱，促使了传统的文人结社走向家族圈，因为这样的结社更具隐蔽性和安全性。

文人结社对于家族发展也具有多重文化意义：第一，结社是家族文人的精神寄托和情感宣泄的重要文化活动，有助于家族文人的成长和生存；第二，结社为家族文人提供了交流平台，有助于家

族内部成员文学和文化的交流，进而推动家族文学和文化的建设和繁荣；第三，结社为家族成员对外交流提供了平台，有助于家族之间的文学和文化交流，进而提升家族的文化和声；第四，由于结社多以地方性家族文人为主导，因此结社为地方文学和文化交流提供了平台，有助于促进地方文学和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清代两浙文学女性的结社也是一个突出现象，同样是建立在家族文化圈的基础上，但具有独特的文化和意义，典型地体现了清代家族女性从闺内走向社会、从文学唱和到参与政治的历史演变。清初蕉园诗社是著名的女子诗社，虽然颇有一些“向男性文人看齐”的诗社举动，诸如以“姊妹”相称，重“金兰契”、“生死盟”、“蒹葭秋水盟”之类的活动，^[33]但她们终究还处在闺门之内，属于一门群从性质。到清中期，以随园女弟子群和碧城仙馆女弟子群为代表，她们不顾社会的偏见和批判，拜他族男性为师，进行诗文唱和，终于迈出了家门，走向了社会。清末由石门徐宝谦孙女徐自华、徐蕴华姐妹为主导的“秋社”，其诗社活动则由诗文唱和走向了反清革命，对秋瑾的慷慨就义寄予了悼念和追随。此后她们又加入南社，与男性一起举起反清革命的旗帜，赋予了古代家族女性文学和女性结社的新内涵，翻开了妇女自我解放的新篇章！

参考文献：

- [1]梅新林.文学世家的历史还原[J].中国社会科学,2011(1):177-191.
- [2]陶澍.太湖厅浚雕鹗诸河碑记[M]//陶澍集:下册.长沙:岳麓书社,1998:26.
- [3]陈国灿.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社会的城市化特征[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9(3):13-17.
- [4]蒋兆成.明清时期杭嘉湖地区乡镇经济试探[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1):62-72.
- [5]吴仁安.明清江南著姓望族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82.
- [6]多洛肯.清代浙江进士群体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115.
- [7]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史[M].南京:大象出版社,2001:

- 271-321.
- [8]钱明.“两浙”地域文化性格差异与当代浙江之发展[J].教育文化论坛 2011(3):9-13.
- [9]章学诚.文史通义[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 [10]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17.
- [11]赵红娟.明清湖州董氏文学世家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10.
- [12]宗韵.明代家族上行流动研究:以1595篇谱牒序跋所涉家族为案例[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181-182.
- [13]曹树基,李玉尚.太平天国战争对浙江人口的影响[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5):33-44.
- [14]李润强.清代进士的时空分布研究[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42(1):62-68.
- [15]朱彝尊.静志居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715-716.
- [16]魏禧.《曝书亭》序[M]//朱彝尊.曝书亭全集.王利民,胡愚,等.校点.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9:40.
- [17]陈廷敬.翰林院检讨朱公墓志铭[M]//朱彝尊.曝书亭全集.王利民,胡愚,等.校点.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9:755.
- [18]黄汝亨.寓林集:卷一五[M].刻本.刻印者不详,1624(天启四年).
- [19]蒋寅.清代文学论稿[M].南京:凤凰出版社 2009.
- [20]冯金伯.国朝画识[M]//周骏富.清代传记丛刊:第71册.台北:明文书局,1985:802.
- [21]张廷枚.国朝姚江诗存:卷四[M].刊本.姚江:张氏宝墨斋,1773(乾隆三十八年).
- [22]徐雁平.清代世家与文学传承[M].北京:三联书店 2012:118-119.
- [23]黄宗羲.李杲堂先生墓志铭[M]//黄宗羲全集:第十册.沈善洪,主编.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5:411-412.
- [24]全祖望.李杲堂先生轶事状[M]//鮑琦亭集外编:卷十一.刻本.姚江:借树山房藏板,1872(同治十一年).
- [25]杨谦.梅里志:卷五[M].刻本.刻印者不详,1877(光绪三年).
- [26]梅新林.建安文人集团的崛起——中国文学流派正式形成的标志[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6 21(6):31-35.
- [27]周明初.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文学流派综论[J].社会科学战线 2008(11):165-171.
- [28]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三七[M]//朱彝尊.曝书亭全集.王利民,胡愚,等.校点.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9:430.
- [29]金一平.柳洲词派——一个独特的江南文人群体[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2:3.
- [30]杨泰亨.慈溪县志:卷四九[M].刻本.慈湖:德润书院,1899(光绪二十五年).
- [31]周星誉.鸥堂日记:卷三[M]//鸥堂日记·廛橧日记.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42.
- [32]余德余.绍兴的文人结社(续完)[J].绍兴师专学报,1991(1):35-41.
- [33]吴晶.蕉园诗社考论[J].浙江学刊 2010(5):66-74.

Literary Families in Zhejiang during Qing Dynasty: Geographical and Historical Distributions and Literary Achievements

ZENG Li-jun

(Center for Studies of Southeast Chinese Culture,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China)

Abstract: Geographically, the literary families in Zhejiang Province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1644 – 1911) were chiefly located in five prefectures: Hangzhou, Jiaxing, Huzhou, Ningbo and Shaoxing, and there were more such families in Western than in Eastern Zhejiang. Historically, the number of literary families was dwindling throughout the Dynasty, slumping in the first half and continuing to fall off in the second. The inheritance of literature in these families was with rich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colors, characterized by full integration of family traditions, local features and literary genres. These families were not only devoted to the literary activities within themselves but also initiating and contributing to the local progress in literature. Literary schools and societies at that time were mostly participated in or even organized by members of these families, and therefore based on the familial culture.

Key words: Zhejiang Province in the Qing Dynasty; literary families; geographical and historical distributions; literary achievements

(责任编辑 吴波)